从 1959 年经济所两件事说起*

唐宗焜

今天所庆,我想讲经济所经历过的事情,说点感悟。

我先从 1959 年的两件事说起,涉及的是一篇学术论文和两个调查报告。两个调查报告都是经济所参与工作组撰写的,先后在 4 月和 5 月份完成。4 月的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以《党内通信》批示下发,他指出:报告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要求各级党委都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可是 5 月的报告,也就是吴敬琏老师提到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却在庐山会议上被指名批判:食堂是好东西,无可厚非,可是有一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经济所一下就被炸晕了。于是,参与工作组的负责人董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可是到 1961 年,农村公共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这时候终于肯定说,在 1959 年只有科学院参与调查组是正确的,董谦因此得到了平反。

另一篇学术论文是什么呢?就是孙冶方的《论价值》,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不过巧合的是,孙冶方这篇论文完稿日期是 1959 年 8 月 2 日,而这一天恰恰是庐山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这篇论文发表在 1959 年第九期的《经济研究》上,在该期刊物之中,孙冶方这篇论文是唯一的学术论文,其他的篇幅都是转载庐山会议的公报和决议,并发表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孙冶方这篇文章排在最后一篇。

《论价值》是孙冶方的代表作,他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价值是效用与费用的比较,也就是有用效果和劳动耗费的比较。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调节及其所支配的社会劳动在各类生产间的分配,也就是我们讲的比例关系,正是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这个调节作用存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孙冶方的价值是计算价值,忽视了价值规律同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内在联系,这是美中不足,但是他的学术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价值规律是不是能够调节社会主义经济,一直是困扰经济理论研究的难题。而孙冶方独树一帜,突破了这个理论困境。同时,他的价值论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不计成本的得不偿失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些都是违背价值规律的恶果。而"得不偿失""比例失调"恰恰是庐山会议不允许讲的,也是第九期《经济研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那批文章所批驳的,所以跟庐山会议一对照,可以看出来真理在哪一边。

所以,1959 年这两件事,也就是说两个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还有一篇探索性的学术论文《论价值》,是经济所历史上体现科学精神的范例。

任尔东南西北风,孙冶方咬定他的价值论不放松,以他的价值论为纲,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组织全所来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薛暮桥、于光远共同发起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再生产三大问题的讨论。三大问题的讨论就是要从理论上吸取"大跃进"的教训。

孙冶方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实践背景,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能够独立思考,提升到理论,形成他的观点。他也很重视调查研究,1961 年亲自率领了调查组到上海进行调查。1961—1963 年间,他以其《价值论》和实际调查成果为指导,撰写了三个内部研究报告,

* 唐宗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原常务副主编。

也就是《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的问题》《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在国内开创了经济体制研究的先河。

昌黎工作组也叫“昌黎试验田”,是孙冶方在经济所领导工作中的一个创造,这个工作组不是一般的调查组,而是蹲点挂职参与实践,同当地干部和农民一起工作、劳动、生活,并且在实践中调查研究,因为能够反映实际情况,是经济所理论研究同实践联系的一个试验,所以叫试验田。

孙冶方到任以前,经济所研究人员最大的苦恼是看不到经济部门的资料,因为当时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孙冶方到所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研究人员了解实际情况创造条件。采取的措施是:第一,向中央申请经济所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第二,经济所迁址,从中关村迁到三里河,因为三里河是经济机关集中的地方;第三,创立试验田。这三项都做到了。

孙冶方是有思想、有明确的自主方针的所长,所以他能够凝聚人心,引领经济所在学术上砥砺前行。可惜他未能如愿、未能大展宏图。但是他求真探索的科学精神深深影响着经济所人。

经济所真正能够了解实际,应该开始于改革开放。我个人也在调查研究中受益匪浅,而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 1983—1984 年间的“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研究。这是经济所和世界银行第一个合作研究项目,选择了 20 个企业,包括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体制都要进行全面调查。我们逐个访谈厂级领导人和中层干部,听他们讲述详细情况,并且及时整理出访谈记录,课题组成员撰写研究报告和论文。

这个调查研究彻底颠覆了我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传统观念,认识到计划经济不可行,国有企业体制需要改革,并且初步感悟到这个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

这个合作研究项目调查研究结果使我从苏联范式解放出来,形成了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理念,通过剖析实际经济过程的机制去揭示经济的本质,我以后的理论研究和主编《经济研究》的过程中,都是这样努力去做的。

顺便再说一点,这个项目给经济所留下了一套非常珍贵的调查原始资料,它们是作为改革起点的国有企业体制原貌的标本,不可复制,但是可以被后人不断继续开发。

总之,理论研究必须尊重实践、独立思考、求真探索,随波逐流和人云亦云是学术界大忌。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刘新波)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